

情绪智力与口译研究

——以几个特殊领域的口译为例

邱进 廖雪汝

(重庆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2160)

摘要:情感等非认知因素参与认知活动并对认知过程和认知结果产生影响,但翻译的非认知研究却处于被严重忽略的状态。与笔译相比,情绪智力对口译的影响更显著。特别是一些特殊领域的口译员会面临诸多压力和情感敏感情境,要求其具备较强的情绪管理能力、抗压能力和社交能力等。情绪智力的多个要素与口译员特别是国家安全事务、医疗口译、法庭口译、手语口译、警务口译等特殊领域口译员需具备的特质相关。情绪智力与口译的种种关联使之成为口译研究的新切入点,将拓展其研究视野,充实其研究内容,推动口译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情绪智力;情绪;口译研究;非认知;口译员;特殊领域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0)01-0141-08

0 引言

多年来,认知取向的翻译研究在国内外翻译学界一直是一大热点,国内对翻译的认知研究尤为偏爱。2017年召开的认知取向的翻译研究全国性学术会议有四个,即首届全国翻译传译认知高层论坛暨中国翻译认知研究会委员会成立会议(2017年5月5—7日)、首届中国生态翻译与认知翻译研讨会(2017年8月4—6日)、第四届翻译认知国际研讨会(2017年11月3—4日)、“一带一路”背景下翻译传译认知国际研讨会暨中国翻译认知研究会第二届大会(2017年11月10—12日)等。以翻译认知为研究重心的全国性学术组织有两个,即中国翻译认知研究会和中国生态翻译与认知翻译学会。翻译的认知研究已成为国内翻译学界的一大主流,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与此相反,翻译的非认知研究却长期被严重忽视,不仅尚未召开过以翻译的非认知研究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会议,也未成立以翻译的非认知研究为重心的全国性学术组织,非认知研究的成果更是凤毛麟角。认知因素与非认知因素都能对人的活动产生影响,而且非认知因素普遍存在于认知过程之中,两者常常相互作用,共同影响认知结果,甚至有时非认知因素能独立地影响认知结果。作为翻译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口译研究,当下主流是重视认知层面的研究,而对情绪智力等非认知因素的研究尚待起步。

情绪是主要的非认知因素之一,是影响口译的一个重要因素,有可能显著影响口译活动。相比笔译人员,口译员面临的压力更大,情绪等非认知因素对口译活动的影响可能更甚。为什么两个专业背景、年龄和性别一样的口译员在从事同一性质的口译工作时,其口译质量会存在明显的差异?在试图解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翻译学界逐渐认识到了某些非认知因素的价值,认为情绪、性格等非认知因素可能有助于解答此问题(谢柯等,2017),一些翻译研究者已从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视角对翻译展开了初步的研究。情绪智力这一概念由美国心理学家Salovey等(1990)提出,引起心理学界极大关注,现已成为心理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而且情绪智力理论及基于此的测评工具被广泛应用于诸多领域,如企业管理、教育、医疗、法

收稿日期:2019-09-15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重点项目“基于国家翻译实践理论的汉语经典英译研究”(19SKGH153)、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一般项目“创客教育视阈下的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1932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邱进,女,重庆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

廖雪汝,女,重庆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

律等。当前国内外基于情绪智力的翻译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研究成果还很少,但已有的一些研究表明,情绪智力中的情绪知觉与表达、移情、压力管理、自我激励、适应性等与翻译实践关系密切,情绪智力能为翻译学的诸多议题提供一个全新的研究路径和框架(Hubscher-Davidson,2013;谢柯等,2017)。由于口译的性质和特点,情绪智力对口译实践的影响可能要大于笔译实践,但目前基于情绪智力的口译研究还十分缺乏。本文将简述情绪智力的一些重要方面,分析其与口译的关系,着重论述情绪智力在几个特殊领域口译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具体的研究路径。

1 情绪智力的模型及预测效度

1.1 情绪智力的模型

美国心理学家 Salovey 等(1990)提出了系统的情绪智力理论,并分别在 1997、1999 和 2000 年对情绪智力的定义进行了三次修正,2000 年的修正版情绪智力定义沿用至今,即情绪智力能力模型。Salovey 等的情绪智力能力模型由四个不断递进的维度构成,后一种能力以前一种能力为基础。第一个维度即情绪智力的最基本能力是情绪感知和表达能力,即从自己的生理状态、情感体验、思想及他人、语言、艺术活动中辨认和表达情绪的能力,此能力为其他能力提供基础。第二个维度是情绪促进思维的能力。Salovey 等在 2000 年修正情绪智力能力模型时,特别强调情绪智力是一种与认知运作有关的心理能力,作为非认知因素的情绪与认知因素具有密切关联。已有大量研究表明,情绪在知觉、注意、记忆、执行控制和决策中起关键作用,情绪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认知过程和认知结果(Tipples,2008)。第三个维度是情绪理解能力。此层次的能力能使个体理解情绪所传达的意义,并能将情绪体验与语言表达联系起来,是一种能理解复杂心情、认识情绪转换的可能性及原因的能力。此能力在四层次能力中认知意味最强,是 Salovey 等最早提出的情绪智力三因素模型中没有的。第四个维度是情绪管理能力。这是最高层次的能力,主要是指个体能根据所获得的信息恰当地进入或脱离某种情绪、调节自己和他人的情绪的能力。个体能利用和调节所产生的情绪是情绪管理能力的最佳表现形式。Salovey 等提出的情绪智力能力模型是在心理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情绪智力模型,简单来说,其本质是辨认不同情绪的意义及其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推理和解决问题,及利用情绪改善认知活动的能力(彭正敏等,2004)。

除了情绪智力的能力模型,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其他的模型,具有代表性的情绪智力模型还有三个,即 Bar-On 的混合模型、Goleman 的胜任特征模型和 Petrides、Furnham 的特质模型(谢柯等,2017)。这些模型与 Salovey 等提出的能力模型的最大区别在于其不仅包含心理能力,还包含了其他人格特征。Bar-On 提出的情绪智力混合模型由个体内部成分、人际成分、适应性成分、压力管理成分和一般心境成分五个维度构成。Bar-On 提出的模型已涉及某些人格特质,如人际成分。Goleman 的胜任特征模型包含五个因素,即自我意识、自我调节、动机、情感移入和社会技能。虽然 Goleman 也认为情绪智力是能力,但他描述的一些特点,如为委托人和客户服务及对组织承担义务等,不能简单地归为能力因素。Goleman 对情绪智力的定义比较宽泛,将人格因素也纳入了情绪智力,不像 Salovey 等将情绪智力严格界定为非认知心理能力。与能力模型差异最大的是特质模型,特质模型反对将情绪智力看作是一种能力,而是主张将其纳入人格特质的范畴。Petrides 等(2001)提出的情绪智力特质模型包含情感性、社会性、自我控制和幸福感四个维度,他们认为情绪智力包含人格领域的诸多倾向。Bar-On 的混合模型、Goleman 的胜任特征模型和 Petrides 等的特质模型在一定程度上都属于情绪智力的特质模型,只是人格特质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不同。

虽然情绪智力有诸多不同的模型,但这些模型并非水火不容。情绪智力的这些模型都包含一个共同要素,即对情绪的感知、理解和运用,而这一点正是情绪智力的核心。在研究情绪智力和将其应用到实践领域时,科学的做法是依据特定的目的、对象等选择特定的情绪智力模型,甚至整合相关模型。情绪智力还处于不断发展之中,没有哪一种模型是完美的,不同的模型各有优劣,不同模型之间应是互补的关系。近年来,心理学界出现了情绪智力理论整合的倾向,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无疑能促进情绪智力的发展并优化其应用。

1.2 情绪智力的预测效度

Goleman 的畅销书 *Emotional Intelligence: Why It Can Matter More Than IQ* 使情绪智力的概念在全球广为传播,很多领域看到了情绪智力的应用价值,一些企业、组织和学校甚至将情绪智力作为选拔人才和进行企业与教学改革的重要依据之一。根据不同的情绪智力理论模型,大量的情绪智力测验工具被开发出来。情绪智力测验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基于 Mayer 等的情绪智力能力模型开发出来的测验工具,即 Mayer-Salovey-Caruso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est(MSCEIT);二是基于 Mayer 等的情绪智力能力模型开发出来的自陈或他评测验,如 Workshop Emotional Intelligence Profile(WEIP)、Swinburne University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est(SUEIT);三是基于 Bar-On、Goleman、Boyatzis 和 Petrides 等人的情绪智力特质模型开发出来的自陈或他评测验,如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nventory(EQ-i)、Emotional Competence Inventory 360(ECI-360)、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estionnaire(TEIQue)。这些情绪智力测验工具纷纷被运用到不同实际工作领域和研究领域,特别是被用来探究情绪智力与工作绩效、事业成功、学业表现等方面的关系。大量研究表明,情绪智力与工作绩效密切相关(Mills,2009)。这些研究也得出情绪智力的诸多方面与事业成功和学业表现有显著相关性的结论,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事业和学业的走向(Di Fabio et al.,2014)。情绪智力研究的时间还不长,还存在一些理论问题需要解决,但大多数的研究都表明,情绪智力与社会适应能力、工作绩效、生活或工作满意度、学业表现、学习或学术能力等方面的许多指标存在正相关关系,情绪智力对这些方面具有较强的预测力。总的来说,绝大多数无论是基于能力模型还是特质模型的情绪智力测验都具有较高的预测效度,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化,将会出现具有更高预测效度的修订版甚至全新的情绪智力测验工具。

2 情绪智力与口译

韩子满(2017)指出,当前国内翻译研究的一大症结是过于迷恋理论和研究方法创新,轻视研究对象,许多值得研究的翻译现象无人研究或研究不深入。虽然此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现实,但是一些有潜在价值的议题确实没有引起翻译学界的关注,其中研究严重不足的一大方向就是口译的非认知研究。近年来,口译认知研究发展迅猛,已成为翻译研究的热点,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口译研究领域。与口译的认知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口译的非认知研究却乏人问津,出现了“一冷一热”的现象。任何活动都不可能只涉及认知因素,非认知因素必然会或多或少地牵涉其中。非认知因素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对人类活动产生影响,还常常和认知能力产生交互作用,共同对人类活动产生影响,高度复杂的口译活动更是如此。对口译非认知研究的严重不足导致的结果就犹如一个人缺了“一条腿”,至少是像一个“跛脚”之人。没有非认知因素的参照,对口译认知因素作用及运行机制的认识也可能会比较片面,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也会损减。

情绪智力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非认知能力,在口译实践中能产生不可忽略的作用。由于要求口译员要瞬时翻译出讲话人的信息,还要保证较高的正确性和流畅性,这很可能会使口译员产生较大的时间压力和误译压力。除了这两类常见的压力,口译员还可能产生其他压力,如庭审口译员可能面临道德压力,冲突地区的口译员可能面临危险压力等。口译员在压力下进行口译任务会产生焦虑、紧张、恐惧等负性情绪,影响口译质量。抗压能力差的口译员不仅会影响工作绩效还会影响自身的职业满意度,既影响口译工作的客户满意度又不利于口译职业的发展。无论是哪一种情绪智力模型,都涉及抗压。Salovey 等的能力模型的第四维度是情绪管理能力,其中就涉及调节自身情绪以应对压力。Bar-On 的混合模型其中的一个维度是压力管理成分,与抗压直接相关。Goleman 的胜任特征模型中的一个因素是自我调节,与抗压高度相关。Petrides 等的特质模型中的自我控制维度也与抗压具有相关性。口译员与笔译者的一大区别是口译员要与不同类型和领域的人打交道,口译工作对口译员的社交性和适应性有明确要求,口译工作的绩效与此相关。英国的 The National Centre for Languages 发布的 National Occupational Standards in Translation 明确指出,适应不同工作环境的人际交往能力是合格职业译者的核心能力之一(The National Centre for Languages,2007)。欧盟委员会的 Directorate-General for Translation 也指出,合格的译者需具备适应不同情境和与不同团体互动的能力

(EMT Expert Group, 2009)。而情绪智力四大主流模型中,除 Salovey 等的的能力模型没有强调社交能力和适应能力外,Bar-On 的混合模型(其中的人际成分和适应性成分维度)、Goleman 的胜任特征模型(其中的社会技能因素)及 Petrides 等的特质模型(其中的社会性维度)都凸显了这两种能力。情绪智力与口译还有一大关联,即对情绪信息的识别、理解和表达,情绪智力的任何一种模型都对此进行了强调,是情绪智力理论的核心。文化交流、经贸、科学技术等一般领域的口译涉及的情绪信息可能不显著,但法律、医疗、军事、安全等领域的口译实践常常需要口译员能辨识并理解讲话人的情绪,并以能促进预期目标实现的方式进行情绪表达。不仅如此,这些特殊领域的口译任务对口译员的抗压能力、社交能力、适应能力等有更高的要求。大量的口译认知研究表明,口译是一种高级的认知活动,涉及知觉、注意、记忆、思维、理解、概括、推理等诸多认知能力(许明,2008)。既然心理学界已经公认,情绪等非认知因素与认知因素能产生交互作用,情绪等非认知因素能独立或与认知因素共同对认知过程和认知结果产生影响,那么情绪很有可能也会影响口译的认知过程和结果。也就是说,口译员的情绪智力与认知能力可能存在相关性,可能会影响口译认知过程的信息加工,影响口译质量。

3 情绪智力与几个特殊领域的口译

当前国内外基于情绪智力的口译研究成果还非常少,少数学者的研究多属间接性研究。Nicholson (2005)的研究证明,情感性强的口译学员的口译能力比情感性低的口译学员强。有研究表明,手语口译涉及某些性格要素,情感因素与口译表现存在关联。情感等性格要素与口译员的工作能力也存在相关性。Singureanu (2016)的研究发现,情绪智力高的口译员的适应能力和社交能力等更强,其工作绩效和职业满意度也更高。国内的康志峰(2016)指出,元情绪对口译员的工作表现能产生影响,其教学实验也证明元情绪能影响学生译员的口译行为和口译效果。当前基于情绪智力的口译专门研究还极少,零星的研究成果仅是考察口译的一般情况,个别学者还考察了手语口译,但其他具有现实意义且能凸显情绪智力重要性的口译领域则无人问津。下文将聚焦几个特殊口译领域,论述情绪智力在这些口译实践中的重要价值,并提出具体的研究方向。

3.1 情绪智力与国家安全事务口译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开始研究以国家安全为导向的外语能力和教育问题,认为在国家外语教育中应将国家安全作为重要参数,构建更强的国家安全性(文秋芳等,2013)。国家安全导向的外语教育不仅涉及语种建设,作为外语能力重要组成部分的翻译能力也应成为其中一部分。而且以国家安全为导向的口译教育不能仅侧重于双语转换能力,其他能力和特质也应重视,如保密意识、职业伦理、性格特质、社交能力、情绪智力等,甚至应成为选拔从事国家安全领域口译工作人员的前提条件,也应在培养国家安全领域专业译员过程中特别予以强调。

进入 21 世纪后,世界主要国家都致力于发展经济,世界和平指数也显著提高。但和平外衣下却时常涌动威胁国家安全的暗流,以 ISIS 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对世界和平构成了重大威胁,局部战争或冲突频发,间谍活动也比较活跃。国家安全领域的口译员成为特殊的口译员群体,虽然数量远少于一般领域的口译员,但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国家安全领域的口译员的主要工作是,在审讯或面试恐怖分子和涉嫌恐怖主义人士、间谍和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人士、战争或冲突牵涉人员、申请移民和避难人员时,充当审讯官或面试官的口译员。前三类属典型的国家安全事务,移民和避难等也可能涉及国家安全,这些领域常常被忽略。鉴于以往发生过移民或难民实施恐怖袭击,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内相继出现了一种声音,那就是担心移民和难民会增加其遭受恐怖袭击的风险,应加强对移民和难民的管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安全,谨慎处理此类问题是合理的。国家安全领域的口译工作关乎国家与人民的安全,若是处于战争场域,口译员会面临安全压力,其情绪更易受到影响。情绪智力能力模型的其中一个维度就是情绪能促进思维的能力,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境下,口译员的口译认知能力,如双语口头转换能力和工作记忆等,很可能会受情绪的影响。此外,国家安全领域的口译工作要求口译员具备更强的情绪感知和理解能力,情绪管理能力与压力管理能力

也比一般场合的口译员要求更高。在口译水平相当的情况下,应优先选聘情绪智力高的口译员从事国家安全领域口译工作。口译员并非完全隐身的,口译员常常是口译活动的参与者,对谈话结果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口译员在现实口译活动中展现出了不同的角色,不仅仅是“传声筒”。国家安全领域的口译员更是如此,不可能仅扮演语言转换者的角色。口译员与涉及国家安全的被审讯者或被面试者说同一门语言,且了解其文化,有可能口译员对被审讯者和被面试者的独特语言风格、隐藏在语言和副语言中的信息有更敏锐的洞察力,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口译员和被审讯者及被面试者才是更直接的对话者。口译员应成为审讯者或面试者的协助者,充当助理审讯官或助理面试官的角色,审讯者或面试者与口译员共同协作,挖掘重要信息,维护国家安全。在审讯者或面试者主导的基础上,口译员应能准确辨识被审讯者或被面试者隐藏在语言和副语言(如表情、语气、动作等)中的情绪和态度,深刻理解特定情绪的意义,并对被审讯者或被面试者的情绪进行准确的表达。国家安全事务口译员还会和相关领域的官员和专家打交道,其社交能力是促进工作顺利完成的保证。还有一点不可忽视:涉及国家安全事务的场合往往会给口译员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其情绪还可能在审讯或面试过程中受到影响,口译员若不能准确辨识和理解自身及他人情绪,管理情绪,产生的负面情绪必定会影响口译质量,影响口译员的工作绩效和职业满意度,还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危险。也就是说,从事国家安全事务的口译员的情绪智力需涵盖能力模型和特质模型中的相关要素,能力模型中的情绪促进思维的能力要素与口译基本质量密切相关,能力模型中的情绪感知、理解与管理能力及其特质模型中的人际、适应、社交与压力管理等要素与口译质量也有较强的关联,而且情绪智力的这些要素还关乎口译员作为助理审讯官、助理面试官等角色的扮演程度问题,对促进国家安全能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一般场合的口译员可能不需要较高的情绪智力,但专门从事国家安全事务的口译员,情绪智力应当是不可或缺的核心能力之一。

基于情绪智力的国家安全领域的口译研究可主要从以下三个方向展开:(1)深入探究情绪智力及其要素与国家安全事务口译的关系,如探究其与国家安全背景下的口译行为、口译认知、口译质量、工作绩效、职业满意度、独特角色发挥等的关系;(2)从情绪智力视角对从事国家安全事务口译工作的口译员进行系统研究,可依据不同参数进行对比研究,探究此领域不同类型口译员的异同,甚至探究他们与其他领域口译员的异同;(3)研究情绪智力对国家安全事务口译员培训和专门人才培养的启示,构建特色人才培养模式和培训机制。

3.2 情绪智力与医疗口译

随着国际交往的深化,在我国生活的外国人士数量显著增加。2006年仅在中国珠三角生活的外国人就已经达到30万,而且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中国工作和旅游的外国人数量将会不断增加。一旦有医疗需求时,大多数外国人则选择回国或赴香港治疗,出现了外国人士舍近求远寻求医疗救助的现象。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沟通环节的欠缺严重影响了外国人士对中国医院和医生的信任度。2009年美国国家医疗口译认证会(The National Board of Certification for Medical Interpreters)和美国医疗口译认证委员会(Certification Commission for Healthcare Interpreters)成立,并于2010年组织实施了医疗口译员资格认证考试。此资格认证考试除了涉及译前准备、医学知识、语言转换能力外,还涉及与医疗人员的交际、临床表现、文化意识等方面的内容。一般场合的口译,如会议口译、商贸交流口译等,更多的是要求口译员能快速准确地传达讲话人的信息,扮演语言与文化桥梁的角色。而医疗口译却比一般口译更具挑战性。患者的健康担忧、受疾病折磨、疾病传染风险等情形可能会给医疗口译员带来情感上的压力,医疗口译员需具备异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此外,在医疗口译实践中,医疗口译员扮演的角色比一般口译员多,除了语言转换者的角色外,医疗口译员还具有患者代言人、共同医生、医患关系协调者等多个角色(苏伟,2010:87),这些角色需要口译员具备更强的社交、适应和压力管理能力,即特质模型中的核心成分。医疗口译员还需具备较强的情绪智力模型中的相关能力,他们需辨识和理解自身情绪,管理情绪,有效抵抗压力,保证高工作绩效;医疗口译员需正确辨识并理解患者、医生、医护人员等的情绪,从中协调各方关系,协助各方实现利益最大化。医疗口译属于社区口译,社区口译区别于一般口译的是,前者不是一种简单的信息传递,而是一种社会交际

行为和权益平衡过程。社区口译员往往扮演多重角色,其语言转换能力甚至只具从属性,而其社会交际能力、权利关系的协调与平衡意识、危机与困难处理能力等才更为重要(张威,2016:24)。显然,除了双语口头转换能力外,合格的医疗口译员还需具备较强的社交能力、适应性、抗压能力、情绪识别、情绪理解与表达、情绪管理等能力,这些能力正是情绪智力的重要因素。情绪智力的多个要素与职业医疗口译员需具备的特质具有相关性,情绪智力可能对医疗口译员的工作绩效、职业满意度等产生影响。医疗口译员和国家安全事务口译员一样,需具备情绪智力两大模型的能力与人格特质。

情绪智力可为医疗口译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切入点,其研究可主要从以下四个方向展开:(1)可以考察情绪智力是否能促进医疗口译员不同角色的发挥及其促进程度;(2)探究情绪智力及各要素与医疗口译的关系,探究其对医疗口译质量、译员工作绩效、客户满意度等方面的影响;(3)对医疗口译员与其他领域口译员的情绪智力展开对比研究;(4)探究情绪智力对职业医疗口译员培养的启示。

3.3 情绪智力与法庭口译

法庭是一种易引发情绪和内心冲突的情境,与一般场合口译员相比,法庭口译员更易遭受诸多压力和内心失衡。无论是民事审判还是刑事审判,对当事人的影响都极大,特别是涉嫌重罪的审判。若沟通出现问题,法庭口译员常常是被指责的对象之一,再加上事关重大,法庭口译常常会给译员带来心理压力。此外,可能遭遇的语言困境、法律困境和道德困境也让法庭口译员备感压力(余蕾,2015)。沟通双方的语言水平可能严重不平衡,这会使法庭口译员深陷语言困境。由于法庭口译制度还不完善,如我国对法庭口译人员的资格、操作流程、质量认定等重要问题没有提及,这使得法庭口译员可能陷入程序性困境。由于被告的语言表达可能出现不规范和逻辑不清等问题,处于一种令人同情的状态,法庭口译员在口译策略采用上可能会面临两难选择,有可能会出现过越职业道德的行为。庭审过程中口译员可能遇到的道德困境可能会使其产生道德情绪,而情绪可能影响道德判断(谢熹瑶等,2009;伍如昕,2015)。“Camayd-Freixas 声明”是美国法庭口译员著名的案例,能让我们管窥法庭口译员面临的困境。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在2008年5月逮捕了肉类加工厂 Agriprocessors 近400名以危地马拉人为主的西裔外来工人,其中297人被控“恶性身份盗窃”或“社会保险欺诈”。佛罗里达国际大学西班牙语教授兼美国联邦法院英语/西班牙语资深口译员 Erik Camayd-Freixas 也曾表明,他在担任此案件的法庭口译员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是他23年职业生涯中第一次产生退出的想法。他在“声明”中指出,案件的庭审让口译员无法保持中立,庭审程序存在诸多不规范,产生了令人痛心的后果(Camayd-Freixas,2008)。角色冲突和权利的失衡让资深法庭口译员都萌生退意,可见庭审对口译员的影响。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形:法庭口译员在遇到强奸、谋杀、儿童伤害等案件时,有可能会产生不利于中立性和专业表现的情绪。法庭口译员的抗压能力、管理情绪的能力等对其保持中立、保证高工作绩效等具有重要作用。此外,法庭口译员需正确辨识和理解相关各方的情绪,并作出恰当表达。如代表控方的法庭口译员有必要发挥责任者角色,辨识和理解被告可能在语言和副语言中隐藏的重要信息或态度。情绪表达能力也是法庭口译员需具备的重要技能。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法庭口译员是联系双方的焦点,更具交流的直接性。如在盘问或抗辩时,口译员除了传递代表方的语言信息外,还需保存副语言元素和保持语域(赵军峰等,2011:26-27),口译员需准确传递代表方的情绪状态和话语风格。法庭口译员需在正确辨识和理解代表方情绪状态及话语风格的基础上,准确地进行情绪和风格表达。还有一点也不可忽视,即法庭口译员是连接案件各方的纽带,常常需要与警察、法官、律师、当事人及其他相关人士交流和沟通,社交能力也是法庭口译员必不可少的。从以上论述可知,法庭口译员需具备的情绪智力成分也涉及能力模型和特质模型两大模型中的几乎所有要素,法庭场域易引发情绪变化和内心冲突,能力模型中的情绪促进思维、情绪管理与表达等能力及特质模型中的压力管理成分等就显得十分重要;由于法庭口译员需扮演多重角色,其具备特质模型中的社交能力及能力模型中的情绪感知与理解等能力也不可或缺。

从情绪智力视角进行法庭口译研究是一个全新的方向,研究者可以探究情绪智力及各要素对法庭口译员口译质量、工作绩效、职业满意度等的影响;还可探究情绪智力与司法公正、法庭口译员职业道德、角色冲突等的关系;还可研究情绪智力对职业法庭口译员培养、法庭口译制度等的启示。

除了上述三个领域,情绪智力还可能对手语口译、警务口译等其他特殊领域的口译产生重要影响。手语口译员需充分理解双方的文化差异,能准确辨识和理解各种手势、表情、动作等,能正确表达出对方的情绪状态,积极参与双方的交流,扮演文化调解员的角色。警务口译主要是指对犯罪嫌疑人录口供、审问犯罪嫌疑人、询问目击证人等工作进行口译。警务口译员既要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又要维护司法公正,这可能会使口译员产生心理冲突,影响其情绪状态。警务口译员的情绪对其职业伦理能产生影响(Mulayim et al., 2017:124),工作的难度、重要性和危险性等可能使警务口译员产生诸多压力,影响其工作绩效。职业警务口译员不仅需具备较强的情绪管理能力、抗压能力,还需具备社会交往技能和知识(Mulayim et al., 2017:133)。此外,代表警方的口译员往往需扮演助理审讯人员的角色,需通过语言和副语言等判断犯罪嫌疑人可能刻意隐瞒的信息和态度,这就需要警务口译员具备很强的情绪识别和理解能力。有时甚至需要警务口译员能对犯罪嫌疑人和目击证人等的微表情和微动作等进行识别和理解,判断其是否撒谎。显然,情绪智力的多个要素与手语口译员和警务口译员需具备的特质具有相关性,能为相关研究带来新的认识。

上述特殊领域口译与一般场合口译的共同点是,口译员必须在数秒内准确传译出讲话人的信息,因此面临较大的时间压力和误译压力,也存在一定的社交压力。其不同点在于,一般场合的口译员更多的是将焦点放在双语转换上,扮演的角色相对比较单一,即语言与文化的桥梁;而特殊领域口译的敏感性比一般场合口译高得多,带给口译员的压力更大。国家安全口译关系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事关重大,不容有失;医疗口译关乎患者的生命与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个人福祉与社会和谐;法庭口译关系到一个人的声誉和法律公正,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极大。从事这些特殊领域口译工作的译员面临的压力类型更多,强度更大,口译员需扮演的角色更多元化,这些特殊性要求口译员具备更强的情绪处理能力,还需展现较强的能力模型中的诸多人格特质。这些特殊领域的口译员需具备更强的情绪感知、理解、表达、管理等能力,较强的适应和社交能力等也是必不可少的。

4 结语

当前的口译研究聚焦于与口译相关的认知层面,产生了许多能提升口译能力和口译教学质量的研究成果。但情绪不能剥离思维,情绪智力等非认知要素与认知要素产生交互作用,并对认知过程和认知结果产生影响。情绪智力能力模型中的情绪与思维交互要素与口译的认知能力有强相关性,口译的瞬时性特征常常使口译员面临较大的时间压力和误译压力,对这些压力处理不当会影响口译员的理解、工作记忆、思维、推断、表达等口译认知能力,影响口译工作绩效和职业满意度。

国家安全口译、医疗口译、法庭口译、警务口译等情况更复杂,更易引发口译员情绪和心理的变化,其面临压力的类型更多,程度更大,非认知因素对上述特殊领域的口译员工作绩效及职业满意度的影响更显著。此外,这些特殊场合的口译工作需要口译员承担除语言文化桥梁之外的其他角色,如助理审讯官、助理面试官、医患关系协调者、庭审责任者等,这就要求口译员具备情绪智力的能力模型和特质模型中更多的能力要素,如情绪感知、情绪理解、情绪管理、情绪表达能力及适应能力、社交能力与压力调控能力等。情绪智力在这些特殊领域的重要性不亚于认知能力,研究的有效性突出。与笔译相比,一般场合的口译需要口译员具备比笔译人员更高的情绪智力;而由于国家安全、医疗、法庭、警务等领域的显著特殊性,要求从事这些领域口译工作的译员具备比一般场合口译员更高的情绪智力。

虽然情绪智力对口译研究和实践有重要价值,但当前国内口译研究界对情绪智力等非认知能力的研究严重不足。目前国内尚未出现基于情绪智力的口译专门研究,国家安全、医疗、法庭等领域的口译相关研究更是空白。情绪智力与口译关系密切,将情绪智力引入口译研究是十分有价值的,特别是在当前口译研究“重认知”的背景下,此类研究更显迫切。

参考文献:

Camayd-Freixas, E. 2008. Statement of Dr. Erik Camayd-Freixas, Federally Certified Interpreter at the U. 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 Northern District of Iowa, Regarding a Hearing on “The Arrest, Prosecution, and Conviction of 297 Undocumented Workers in Postville, Iowa”[EB/OL]. [2017-07-24]. <http://judiciary.house.gov/hearings/pdf/Camayd-Freixas080724.pdf>.
- Di Fabio, A. & D. H. Saklofske. 2014. Promoting Individual Resources: The Challenge of 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5):19-23.
- EMT Expert Group. 2009. Essential Competencies for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EB/OL]. [2017-07-24]. http://ec.europa.eu/dgs/translation/programmes/emt/key_documents/emt_competences_translators_en.pdf.
- Hubscher-Davidson, S. 2013.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A New Bridge[J]. *Meta: Translators' Journal*(2): 324-346.
- Mills, L. B. 2009. A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Effective Leadership[J]. *Journal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2):22-38.
- Mulayim, S. & M. Lai. 2017. *Ethics for Police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M]. Boca Raton: CRC Press.
- Nicholson, N. S. 2005.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preter Trainees: The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MBTI) [J]. *The Interpreters' Newsletter*(13):109-142.
- Petrides, K. V. & A. Furnham. 2001. Trai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Psychometric Investigation with Reference to Established Trait Taxonomies[J].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6):425-448.
- Salovey, P. & J. D. Mayer. 1990. Emotional Intelligence[J]. *Imagination, 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9):185-211.
- Singureanu, D. 2016. Language Interpreters and Emotional Intelligence: How Do We Us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Why Does It Matter? [EB/OL]. [2017-07-25]. <http://www.romanianconferenceinterpreter.com/language-interpreters-emotional-intelligence-use-emotional-intelligence-matter/>.
- The National Centre for Languages. 2007. National Occupational Standards in Translation[EB/OL]. [2017-07-24]. <http://211.162.213.9011/www.skillsfca.org/c3pr90ntc0td/images/pdfs/National%20Occupational%20Standards/Languages%20and%20Intercultural%20Working/2007/Translation.pdf>.
- Tipples, J. 2008. Negative Emotionality Influences the Effects of Emotion on Time Perception[J]. *Emotion*(1):127-131.
- 韩子满. 2017. 轻视研究对象—当前国内翻译研究的一大症结[J]. *当代外语研究*(5):66-71, 95.
- 康志峰. 2016. 元情绪维度下学生译员 IMEs 研究理论构想[J]. *外国语文*(5):107-111.
- 彭正敏, 林绚晖, 张继明, 车宏生. 2004. 情绪智力的能力模型[J]. *心理科学进展*(6):817-823.
- 苏伟. 2010. 从“传声筒”到“医患关系的协调者”——一项针对医疗译员角色的实证研究[J]. *外语研究*(5):84-88.
- 王斌华. 2019. 口译的交际协调论——兼论“口译只是认知处理技能吗?”[J]. *外语教学*(1):78-83.
- 文秋芳, 张天伟. 2013. 后“9·11”时代美国国家外语能力建设成效及其启示[J]. *中国外语*(6):4-11.
- 伍如昕. 2015. 论直觉、偏差和情绪在伦理决策中的作用[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14-19.
- 谢柯, 张晓. 2017. 情绪智力与翻译研究:翻译研究的一个新方向[J]. *外语学刊*(5):97-104.
- 谢熹瑶, 罗跃嘉. 2009. 道德判断中的情绪因素——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进行探讨[J]. *心理科学进展*(6):1250-1256.
- 许明. 2008. 西方口译认知研究概述[J]. *中国翻译*(1):16-21.
- 余蕾. 2015. 涉外刑事庭审语境与口译员角色困境[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1-9.
- 张威. 2016. 翻译教学与研究的新热点——社区口译研究述评[J]. *中国外语*(2):20-31.
- 赵军峰, 张锦. 2011. 作为机构守门人的法庭口译员角色研究[J]. *中国翻译*(1):24-28.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 With Interpretation in Some Special Fields as Examples

QIU Jin LIAO Xueru

Abstract: Non-cognitive factors, such as emotions, participate in cognitive activities and exert influence on cognitive process and results, but relevant research has been severely neglected in translation studies community. Compared with translation,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n interpretation is more remarkable. Especially the interpreters working in some special fields will face various stress and emotionally sensitive situations and it requires them to have relatively strong emotion regulation competence, anti-stress competence and social skills. Many elements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re related to the traits that interpreters (especially the interpreters working in some special fields such as national security, medicine, court, sign language and policing) must have. Correlations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interpretation mak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 new entry point of interpreting studies, and it will expand the research vision, enrich the research content and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preting studies.

Key word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motion; interpreting studies; non-cognition; interpreter; special field

责任编辑:陈宁